

● 郑伟章

张海鹏叔侄刻书藏书述略

金吾

清朝人文发达,学问家辈出,促成了我国文献事业的空前繁荣,刻书、藏书和研治目录学、版本学成为一时风气,以至稍涉学问,家中略有余资,即嗜好藏书、刻书,求学、问学之人以不懂目录学、版本学为可耻。在这种风气下,清朝涌现出大批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和目录学家。这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应该值得很好研究的重要课题。

江苏常熟(亦称昭文),在我国文献学史上,是一个极负盛名的地方。明末清初,以刻书、藏书闻名于世的毛氏汲古阁出现在这里;清初,大文学家钱谦益的绛云楼、钱曾的述古

堂、也是园藏书名闻海内;近代四大藏书家中的瞿氏铁琴铜剑楼也矗立在这里;其他中、小藏书家如陆澐、曹炎、席鉴、陈揆、翁同和等,更是不胜屈指。到了清嘉庆、道光年间,这里又出现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刻书家和一个赫赫有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他们是叔侄俩,叔叔叫张海鹏,侄子叫张金吾。传望楼刻书和爱日精庐藏书,在我国文献学史、目录学史上具有很高地位,至今影响甚大。系统地弄清他们刻书、藏书的史实,对研治古典文献学、古典目录学、藏书史、出版史,是有裨益的。

一、张海鹏传望楼刻书

张海鹏,字若云,号子瑜,生于精乾隆二十年(1775年)二月十六日,卒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闰六月初十日,终年仅42岁。他自幼读书很刻苦,21岁补为博士弟子员,因三次参加科举考试不中,“遂绝意名场,笃志坟素”。他死后,虽加以州同职衔加级授朝议大夫阶,但生前实际没有做过任何官。他为人端方正直,乡里无闲言,“设从善局,以济孤寡,捐贖不下二万金”(张金吾《言旧录》)。

张海鹏本家世藏书。他的父亲张仁济和伯父张仁美“皆好藏书,家多宋元旧刻”(黄廷鉴《第六弦谿文六钞》卷四《朝议大夫张君行

状》,以下简称《行状》)。其藏书、刻书处为传望楼,就是祖父张朝绩留下来的。但是,到了他自己,虽仍富藏书,嗜好却为之一变,“治经之暇”,“以剞劂古书为已任”。《行状》说:

“君治经之暇,旁通子史百家言,尝慨古今载籍,几经厄劫,历观史志所载,及藏弃家所著录,存者百无一、二。方今典籍大备,不有以聚而流传之,将日久散佚,此后生读书者之责也。昔吾邑隐湖毛君,以一诸生,力刊经史诸书,广布海内,迄今几二百年,经史旧版,尚供摩印。前事可师,遂矢愿以剞劂古书为已任。”

他选择“以剞劂古书为己任”不是随意的,而是有感于历代典籍散佚损失严重,于是,决心以乡先哲毛晋为榜样,从事刻书事业。他投身于刻书事业,还有更深刻的认识:

“居恒尝语人曰: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视区区成就一己之学业者,其道不更广耶?其拳拳于流传古书,至老弥笃,素志然也”(《行状》)。

他献身刻书,既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嗜好,也不是为了牟私利,完全是为了“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这个目的。他宁可牺牲“一己之学业”,来“拳拳于流传古书”。这种出发点和精神是崇高的,至今仍值得提倡。

张海鹏所刻之书均为大部头丛书、类书和总集,大凡有如下几种:

(一)《学津讨源》20集,收入经史子集各类书170余种,1410卷。是书开雕于嘉庆七年,成书于九年,前有著名学者洪亮吉、劳树棠所写序及张海鹏自序。张海鹏买到毛晋汲古阁所刻《津逮秘书》15集,为书林巨观,在它的基础上“汰之溢之”。既“检旧藏所有”,“更广购自明以来罕见之旧本,互勘去取”(《行状》),还请钱塘藏书家何元锡(字梦华)从文澜阁《四库全书》钞写副本,广为20集。洪亮吉评论说,是书“虽本毛氏之书,而增损之,而又例益严,复加之考证,可云善之善者”(洪氏《序》)。劳树棠也说,张海鹏“尤喜传刻古书,精于校勘,汇宋元以来及古人著述百数十种,取有关于经史实学、朝章典故,足以广见闻、资考证者,刻成丛书,名曰《学津讨源》,盖本《学海》、《津逮》两书之意,沿其流以寻其源也”(劳氏《序》)。是书选入各书均经精选,有毛氏汲古阁刻原书本,有张氏旧藏宋元本和张海鹏自购本,有借自各家之本,亦有钞自文澜阁本。

(二)《墨海金壶》160册,收入经史子集

各书115种,700余卷。是书开雕于嘉庆十七年,藏事于二十二年,前有著名学者石玉楹、赵怀玉、杨希铨所写序,清末上海博古斋影印时,又附有刘承干、莫棠所撰题记。关于其书之梗概,石序云:“余披览其目,凡九经七纬以及史氏遗闻轶事,旁逮兵、农、方技、稗、乘、一家之言,无所不胪列而灿陈之。此其搜罗之广,来访之勤,固非咫闻曲学之士所能及也。”关于书之命名,又云:“当周时,浮提之国,献神通善书者二人,时间出金壶,中有墨汁如漆,洒之着物,皆成篆隶科斗之字,此事载在王子年《拾遗记》。今若云以此义名其书,将使金壶中一点墨,洒遍华严世界,务令古今圣贤文人才士,一切德成艺成之理,无不流行于高天厚地之间,读其书者,皆得聪明智慧增益其所不能”。是书所采辑之书,皆为“有关经史实学、名家论著,而传本将绝者”(《行状》)。

(三)《借月山房汇钞》16集,13函,102册,收入135种。书首有张海鹏嘉庆十七年所写自序,是书花六年而刊竣,当开雕于嘉庆十一年前后。张氏自序云:

“予既增订汲古阁《津逮秘书》而别之曰《学津讨源》,继又有《墨海金壶》之刻。顾念胜国(明朝——笔者按)迄今,著作之家云起林立,我朝(清朝——笔者按)文教涵濡,垂百六十年,经学、考据,尤轶前代,或脱稿而未见及行世,或编刻而流传未广,如玃玉金贝,辉彩散见,不可无以荟蕞而统摄之也。宋左氏《百川学海》,宋人居什之八、九;明吴氏续之、冯氏广之,亦多收明人撰述。窃仿其例,为第三刻。自惭闻见隘陋,未获遍搜名山之作,仅就篋衍所有,余则购访于同志,借钞于友人,得百三十五种,离为十六集。经学、小学、杂史、野乘、奏议、传记、地理、政书、史评、儒家、术数、艺术、谱录以及杂家、小说、诗文评类、本末之学,略具焉。名曰《借月山房汇钞》,识读书之地也。”

这部丛书专收清代学者著述,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都很高。仿鲍氏《知不足斋丛书》,刊为袖珍本,刻印甚佳,一时“海内争睹,书林中之挟秘册、怀坠简者争集”,“流布日广”。其中有四库未收之书《两京新记》、《九国志》、《琴川志》等书。

(四)《太平御览》1000卷。是书编成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征引古书达2800多种,保存了大量已佚文献的史料,久负盛名,素有我国“类书之冠”的称誉。张海鹏从同宗藏书家张燮家里借来明钞本作底本,又向何元锡借来影宋钞本,再三翻校比勘。这两种本子所缺的两册,又请何元锡至宁波范氏天一阁中钞补配齐,务使臻于完善。是书校勘工程浩大,张金吾亦与校勘之役。

(五)《金帚编》。是书未刊成,《行状》提及此书,云:“又搜辑次第续刊,书成,将名之曰《金帚编》,惜工始而君捐馆矣。”《常昭合志稿》卷32“藏书家”海鹏本传更简略:“又辑《金帚编》”。故是书之概貌不得而知。

张海鹏“拳拳于流传古书,至老弥笃”,一生刊书数千卷,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他非常勤劳俭朴,一心扑在刻书事业上。平素,他“屏绝时趋,古朴自喜,家计粗给,而自奉俭约如寒素”,“性好劳恶逸,黎明即起,漏三下不息。迨梨枣役兴,手一编,丹铅左右恒彻晓,了无倦容”(《行状》)。这种知识分子埋头苦干、兢兢业业、献身事业的精神,是可钦可敬的。

第二,他非常重视所刻书籍的精选。其所刻之书大多为流传绝少,有关经史实学之书,读者想得而无处寻觅者。比如《墨海金壶》,“诸书系文澜阁本居多,从宋刻旧槧钞录者什之三”。“刊书原以存亡继绝,故四库书中所云原本久佚,从《永乐大典》录出者亟登之。余则虽有传本而板已久废,始行著录”。“书必完帙,不取节录”(《凡例》)。

第三,他非常重视刻印书籍的校勘工作。他“延致好学知名之士,相与分校,订讹析谬,悉心谘访,间有不合,断断辩论,必洞彻无滞而后已”(《行状》)。他在《墨海金壶》凡例中明确强调:“校订不憚再三,有彼此互异,而未敢妄定者,间附小注两存之”。可见他对书籍文字所取的慎重态度。

张海鹏晚年家道中落,《金帚编》开雕不久即捐馆。卒后5年,其藏书、刻书之所传望楼遭火灾。张金吾《言旧录》云:

“道光元年,辛巳,七月十一日,传望楼灾。传望楼者,曾大父东岩公(张朝绩——笔者按)所创建,大父讷斋公(张仁济——笔者按)分授叔父者也。上下二十六楹,书籍、板片、字画、古玩,凡珍贵之物皆在焉。火发,尽其中所有一举而空之”。

虽云“一举而空之”,实际上尚有一些书籍板片遗留下来。杨钟羲《雪桥诗话》卷10云:

“嘉庆元年,张海鹏刻有《学津讨源》行世;十七年所刻《墨海金壶》,二十五年毁于火,其残版为金山钱熙祚,并补刊五十六种为《守山阁丛书》,其未善者别为《珠丛别录》。所刻《借月山房汇钞》,有海鹏自撰《千字文》、《萃官词小纂》,未久即归上海陈璜,重编为《泽古斋丛钞》,后亦为钱氏,改题《指海》。”

这段文字,除《学津讨源》刊刻年份和传望楼起火年份略有出入外,均符合事实。钱熙祚,字雪枝,又字锡之,上海金山人,好藏书,尤以刻书著称于世。其所刻《守山阁丛书》胡培塈序,《指海》董康跋,言及二书之刻均据张海鹏残留版片,重加校补增益而成。海鹏一生心血尽萃于流布古籍,所刊各大部头书,仍可于各大图书馆寻觅展阅,沾溉世代读者,确乎,其道岂不广而大哉!

二、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

张金吾,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八月初七日出生于常熟县西城尚湖之滨的西关诒经堂故第,卒于道光九年(1829年),年仅43岁。金吾出生时,其父张光基年已五十,其祖父张仁济大喜过望,遂字之曰“五十”。13岁时父丧,16岁时母亲见背,以金吾嘱托其叔父张海鹏云:“惟叔父命是听。”叔父为之取字慎旃,别字月霄。“叔父抚之如子,以教以养,且为经理田产,俾得尽心力学,时时以读书敦本、无坠家声为勖,金吾之稍克成立,叔父之教也”(《言旧录》)。

金吾少既孤,读书益勤奋。8岁,其父为之延师课读,教以自立。老师黄廷鉴,字琴六,品学兼优,好蓄异书,见有秘籍,辄手自传录,有孙道明、钱功甫之遗风,尤喜校讎,有文集《第六弦谿文钞》,为嘉道间著名学者。但金吾在科举道路上甚坎坷,久困小试不中,黄先生引为已咎,以偶染小恙,乃力荐张铎(字叔卿)自代。金吾于嘉庆十三年,20岁,参加院试,补为博士弟子员。后参加省试不售,即弃去,绝意名场。但至暮年穷途末路之时,于道光五年又赴金陵应试一次,仍不售,4年后即去世。

金吾有自订年谱《言旧录》一卷,刘承干得其稿本,刊入《嘉业堂丛书》行世。黄廷鉴撰《张月霄传》,载在文集;李兆洛《旧言集诗人小传》有其小传;又《常昭合志稿》卷32“藏书家”有传。其子张承霖,字英如,候选从九品,长于诗,喜咏忠孝节烈事。承霖闻太平军至常熟而惊吓,遣其子出城,与之诀曰:“贼入城,我死日也,识之。”太平军至,抗声大骂,遂遇害。妻何氏、寡媳程氏、孙子吉祥同日而死,遂无后。

张金吾是清中期著名的藏书家、目录学

家,虽比黄丕烈小24岁,比孙星衍小34岁,但其爱日精庐藏书及所撰书目,与他们齐名。清末蒋光煦所咏《论书目绝句》20首,清代,他把金吾与曹溶、王士禛、王闻远、王昶、朱尊、孙星衍、黄丕烈、吴騫等相并列,可见其影响之大。诗云:

“汲古名高阁久墟,琴川重见辟精庐。倾囊倒篋偿逋去,留得残编证读书。”

(一)学术及纂辑活动。张金吾在科举道路上走不通,便埋头于读书、校讎、纂辑、著述和藏书事业。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他都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关于前者,李兆洛概括说,张金吾“爱书甚挚,读书甚勤,校讎纂辑甚富”(《旧言集诗人小传》),是颇为中肯的。

张金吾生长于考据学派风靡一时的时代,其家又是世代英儒,家富藏书,又受到叔父的濡染,因此他也走上了考据学的道路。他10余岁时,叔父校刻《学津讨源》等书,就让他参加校讎考订书籍的工作,“偶有订证处,辄为叔父许可”(《言旧录》),往往“考据精当”。

关于他一生学术、著述和纂辑活动,他自己有一段总结性文字,他说:

“金吾少学为诗,稍长读书照旷阁,与校《太平御览》读书,为校讎之学者有年;其后泛滥六籍,为考证之学者有年;又其后究心经术,尊汉学,申古义,为声音训诂之学者,又有年;继而,讲求古籍,考核源流,则杂以簿录之学,纂集经说,采辑金文,则杂以汇萃之学,迄今年垂四十,学问无闻,盖藏而不读,读而不专之过也”(《爱日精庐藏书志》自序)。

他有《爱日精庐诗稿》两卷,其诗有袁枚之风,专以性灵为主。考据学方面,他著有《广

释名》两卷、《释龟》两卷、《释冕》、《释弁》、《双声表》、《两汉五经博士考》3卷、《尚书义粹》12卷、《十七史引经考》等著述。

他在纂辑文献方面成绩颇突出,主要有两大成果:一是,花了12年功夫纂辑成《金文最》120卷。金代文献历来无总集,散失严重,他“矢志网罗”,“掇拾遗残”,“凡史书、传记、山经、地志以及金石之记,断蚀之碣,下逮医书、谱录、杂家、小说,旁及二氏之藏,外国之书,苟有残编剩简,无不广搜博采,多金购访”(黄廷鉴《金文最》序)。他三易其稿,勒成巨编,使金代文章精英一旦灿然毕备。二是,花了3年功夫,纂辑《诂经堂续经解》1436卷,重点搜罗宋元人解经、说经之书,以续纳兰性德的《通志堂经解》。这部书未刻版,民国间稿本流入涵芬楼,1932年毁于日寇发动的“一二八”战火中。

(二)爱日精庐藏书及特点。张金吾在学术研究上未登上顶峰,但在藏书和目录学方面却成绩卓著。他弃去科举后,即“慕乡先辈汲古毛氏、述古钱氏遗风,笃志储藏,与同里陈子准善,咸事购访古籍”(《传》)。他有志藏书,自辛未年(嘉庆十六年)始,即与采集金文一同开始,10余年间即多达七、八万卷,至晚年藏书散出之时,藏书规模已达10400卷。陈揆,字子准,家有稽瑞楼藏书,居常熟尚湖之滨稍南,与金吾相距仅半里。张、陈两人不但同里同嗜好,志趣相同,而且还是亲戚,金吾之妹张昭容即是陈揆之妻。黄廷鉴写了一篇《藏书二友记》,对两人的藏书活动及各自特点言之甚详,《记》云:

虞山自钱氏、毛氏后,继起者,“又得两人焉。一曰陈子准,一曰张月霄,二人家世儒学,旧有藏书,至两君而更扩大之。月霄之藏弃,后于陈君十年,不数载,而富与之埒,储藏之名,今遂并甲于吴中。四方之名士,书林之贾客,挟秘册、访异书,望两家之门而投止者,络绎于虞山之麓,尚湖之滨。嘻,盛矣!张居西关,陈

居稍南,相去不半里,皆面城临北,暇辄过从,各出所获,赏奇辨疑,有无通假,相善也。两君志趣同,而各有所立,张则钟于经籍,而兼爱宋元人集;陈则专于史志,而旁嗜说部。其大较以网罗散佚,存亡继绝为宗旨。其于书也,张则乐与人共,有叩必应;陈则一室静研,慎于乞假。”

张金吾嗜书的程度不减黄丕烈,他与陈揆两人“不吝善价购书,书贾来则出入两家,挟以为轻重”。又喜钞书,翁同和在《诂经堂图书后》说,“月霄仿毛氏之例,求工书者精钞之。先公亦尝与其事。先公赴京师,先母每夜篝灯影写至漏尽、目眵事止,所钞者皆张氏书也”(《瓶庐丛稿》卷一)。翁同和当过光绪帝的老师,他的父亲翁广平也到爱日精庐为张氏钞过书;翁广平进京以后,夫人还坚持日夜为张氏钞书,由此可见张氏钞书规模之大以及不惜工本的情景。

关于张金吾的藏书处,《常昭合志稿》卷32云:“张金吾……汇收群籍,合之旧藏,得八万余卷,辟诂经堂、诗史阁、求旧书庄以藏之”。阮元所撰《虞山张氏诂经堂记》亦提及张氏的这三个藏书处。诗史阁、求旧书庄,其他文献未见提及。关于诂经堂,阮元、孙原湘均为之撰《记》一篇。孙原湘在《诂经堂记》中云:“诂经堂者,尊甫心萱翁(即金吾之父张光基,字南有,号心萱——笔者按)所命名,取《汉书》‘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也’”(《天真阁集》卷47)。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中的爱日精庐情形如何?其实,爱日精庐就是诂经堂的别称。据翁同和说:“月霄先生,吾丈人行也。所居曰诂经堂,亦曰爱日精庐,厥后移居板桥之宅,再易主归于吾家,庋陋矣,而有楼屋曲如连环,或曰,此先生度书之所也”(《瓶庐丛稿》卷一《诂经堂图书后》)。道光四年,金吾38岁时,“徙居板桥,距西城故第诂经堂里许”(《言旧录》),徙居之后,旧居就出售给了翁氏。张氏又有照旷阁,为其祖父张仁济所

建。张金吾的藏书印记有：“张月霄印”朱文方印、“爱日精庐藏书”朱文方印、“秘册”朱文长方印、“曾藏张月霄处”等印。

张金吾藏书有五个特点：

第一，张金吾强调藏书是为了读书，不是为秘藏而藏书。他说：“人有愚智贤不肖之异者，无他，学不学之所致也；然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又说：“藏书而不知读书，犹弗藏也；读书而不知研精覃思，随性分所近，成专门绝业，犹弗读也”。读书——藏书，藏书——读书，这就是历代藏书家的宗旨，也是张金吾藏书之真谛。

第二，张金吾所藏多经部书。黄廷鉴指出张氏“钟于经籍，而兼爱宋元人集”，这是与他纂辑《治经堂续经解》一书有关的。金吾在《言旧录》里也提到，“金吾藏诂经之书略备”。正因为这一点，他也才有可能编纂是书。

第三，张金吾所藏多金人著作。黄廷鉴《爱日精庐藏书志序》说：“月霄十年来，……又念金源氏有中国百十余年，著作之家乘时蔚起，未有哀集其文者，遂矢志网罗，以补一朝之缺，故于金元两代遗集更加意搜访，中如王朋寿之《类林》、孔元阶之《祖庭广记》、蔡松年之《明秀集注》，与吴宏道之《中州启札》，皆当世绝无仅有之书也。”

第四，张金吾藏书多宋元旧槧。张氏纂辑《治经堂续经解》，所选多为宋元旧刊及有关实学而世鲜传本者。金吾所编书目中宋元本极多，其审择书籍分为三等，即把宋元旧槧列为上等。他说：“夫所谓审择之者，何也？宋元旧槧有关经史实学而世鲜传者，上也”。

第五，张金吾不秘藏自己的书。这一点，黄廷鉴已明言他“乐与人共，叩必应”。李兆洛与他未谋一面，但向他“源源借书”。听说他去世，李氏哀叹“予无借书处”了，且“购书之路并绝矣”。金吾曾从李松门书坊买到元刻本《说文解字补义》12卷，元人包希鲁撰，如获奇珍瓌宝，思欲据为帐秘。何元锡见到这部

书，羡慕得“击掌不已”，想向他假录副本，他慨然应允，并说：“兹既归予手，若不公诸同好，广为传布，则虽宝如球璧，什袭而藏，于是书何裨？于予又何裨？且予喜藏书，不能令子孙亦喜藏书，聚散无常，世守难必，即使能守，或遭仆狼藉，或水火告灾，一有不慎，遂成断种，则予且为包氏之罪人。同倩善书者录副本以赠。予之不敢自秘，正予之宝爱是书也”（缪荃孙《艺风堂藏书续记》）。具有这样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就是在当今，亦值得人们借鉴。

张金吾晚年，家境艰难。为了买书，他负下累累巨债，爱日精庐藏书尽为债家辇之而去。这一点，各家所记略同。李兆洛云：“闻君为债家所窘，尽没其书”（《旧言集诗人小传》）。顾千里云：“月霄家落，责负者倾囊倒篋，捆载以去”（《爱日精庐藏书志序》）。李、顾与张氏为同时代人，所记是可信的。

“债家”是谁，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同族侄于张承涣。张承涣，字子谦，张大铨之子，也是一个文人，曾为金吾写过一篇《治经堂铭》，其中有这样四句话：“达士旷怀，岂计长久，空诸一切，诒于何有”。张氏当时还自以为旷达，没想到竟成了其书被豪夺而去的讖语。藏书被夺之后，张金吾气愤已极，非常伤心。尤其是夫人季氏，因此抑郁致疾，第二年即去世。张金吾书散妻亡，更是触目伤心，整天以诵读和钞写佛经度日。妻死后的次年，他自己也在穷愁忧郁中死去。

（三）《爱日精庐藏书志》。清代知名的学者、藏书家，无不亲自动手编纂书目、撰写题跋，张金吾亦是如此。他“念藏书考镜，赖有书目，……爱取所藏宋元槧本及新旧钞本之为世罕见者”（黄廷鉴《张月霄传》）撰为书目。《爱日精庐藏书志》，就是他作为一个目录学家所撰写的一部著名的目录学著作。它极负盛名，可与钱曾《读书敏求记》、吴騄《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廉石居藏书记》、黄丕烈《百宋一廬賦注》、《尧圃藏书题识》等相比美。翁同和曾说，这部

书目一经问世,就被“海内珍重”。与张金吾同时的著名学者顾广圻也说,这部书目是读书人书架上“不可无”的书籍。

《爱日精庐藏书志》36卷,《续志》4卷,目前所见有两种本子,一是清道光七年张氏自刻本,1函6册,书前有顾千里序、张金吾自序、旧序及例言等;一是清光绪十三年六月吴县灵芬阁徐氏用集字版校印本,武进费念慈题签,1函10册。

这部书目的编纂过程:金吾的编目活动,据张金吾《言旧录》和《藏书志》自序,是始于嘉庆二十三年。金吾自辛未岁起有志藏书,数年之间,所得不下七八万卷。至这年夏天曝书,乃“罗列于堂,谨依四库部分,编书目二十卷”。这部书目笔者未见,当是一部无解题的简目。

至庚辰(嘉庆二十五年)夏天,又在《爱日精庐书目》20卷的基础之上,“择宋元旧刊及有关实学而世鲜传本者,另为一编,略附解题,以志流别,名之曰《爱日精庐藏书志》”。次年排印出版,黄廷鉴序之。这是一部善本书目提要,仅4卷,亦未读见。

至道光三年,金吾37岁,六七年来,增益藏书甚多,“乃重加编次,附入原书序跋,厘为三十六卷,仍其名曰《爱日精庐藏书志》。”当年,这部书目编成之后,即开始刊印,至道光七年印成。

至道光六年,金吾40岁,又编《爱日精庐藏书续志》4卷,至七年亦刊成。

36卷的《藏书志》加上4卷《续志》,合起来是40卷本的《爱日精庐藏书志》。因它是在旧《藏书志》4卷本(嘉庆二十五年编撰)基础上扩充、重写而成,故旧志也就没有再收入的必要,也许4卷本的旧志已经亡佚,我们已无从睹见了。40卷本《藏书志》是张金吾所撰善本书提要的权威定本。

今北京图书馆又有一种《爱日精庐藏书简目》1册,45页,钞本,笔者初以为是嘉庆二十三年第一次编目的20卷《爱日精庐书目》,

细勘之,大失所望,乃为40卷本《藏书志》的简目,略去每书之提要,仅录书名、卷数、撰者、及注明何种刻本,何人钞校,有何人序跋。这大概是近人在40卷本《藏书志》基础上撮录而成。

40卷本《爱日精庐藏书志》撰成、刊刻之后,其藏书即全部被张承渙攘夺而去。书去可哀,但目成可喜。顾广圻在序中说:“月霄家落,责负者倾囊倒篋、捆载以去。忽一日,月霄迹予于里中,出巨册盈尺,置几上,谓曰:‘此所刻书目、续目也,刻才成而书散,书散可惜,刻成可喜,愿为我序之。’”《言旧录》也表达了金吾对书目刻成的庆幸心情,“况书目流传后世,犹予之书也,目前之在此、在彼,又奚足较?”

《爱日精庐藏书志》40卷本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考镜源流,“标读书之脉络”。我国目录学,自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始,即开解题之传统。至清乾隆间章学诚明确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旨,目录学则更加明确了指导学术研究、指导读书的效用。一部好的书目就是一本读书指南,一部学术史。《爱日精庐藏书志》之所以受到当世及后世人的重视,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顾广圻评论这部书目说:“备载各家之序跋,原委灿然,复略就自叙校讎、考证、训诂、簿录、汇萃之所得,各发解题,其标读书之脉络也欤?”(《爱日精庐藏书志》序)这部书目依四库分类,计著录善本书773种,其中经部146种,史部190种,子部139种,集部298种。每书均有解题。解题除详书名、卷数、著者、版本之外,还仿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之例,载诸书序跋,并对各书识其流别,评骘得失。

关于收录序跋,有一定标准。一是“断自元止”。即元以后的序跋除极个别的以外不录;二是“凡世有刊本,作者有专集行世,经部见于《经义考》、《小学考》者,唐文见于《全唐

文》者,不更录入,余则备载全文”。录入一书之序跋,有得有失,读者览一书之序跋,可了解全书之旨要,是为得;一书有数序,一序有长短,均录入就不胜其繁,徒增卷帙,反使读者不便。后世之《楹书隅录》、《皕宋楼藏书志》、《万卷精华楼藏书志》等就有这样的毛病,是为失。故,对于序不可一概录入,应视情况而定。至于“先辈时贤手迹、题识”,虽仅有校讎岁月,藏弄姓名,但“皆古书源流所系”,是应该“悉为登录”的。

(二)严格著录标准,“以有裨学术治道者为之断”。张金吾在《爱日精庐藏书志》自序里说:

“汉唐以来,书皆传写,后唐始有镂板。自是厥后,书日益多,至于今犖数千金至市,可立致万卷。则当今日而言,藏书亦何足贵?然而藏书不易言矣。著录贵乎秘,秘籍不尽可珍;槧本贵乎宋,宋槧不尽可宝。要在乎审择之而已。夫所谓审择之者,何也?宋元旧槧有关经史实学而世鲜传本者,上也;书虽习见,或宋元刊本,或旧写本,或前贤手校本,可与今本考证异同者,次也;书不经见,而出

于近时传写者,又其次也。要以有裨学术治道者为之断,此金吾别择之旨,不无少异于诸家者也。”

从这段文字可见,张金吾编撰《爱日精庐藏书志》的著录标准是严格的,其标准大体为:

1. 总的来说,要“有裨学术治道”,“有关经史实学”,这就反映了这部书目的时代特征和政治标准,它以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其《例言》中有一条说:“是编义取阐明经训,考证古今,故经史两门所录较备”,“盖编录遗书当以穷经研史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

2. 重宋元刊本及钞本,而轻明以来诸书。其《例言》云:“是编所载只取宋元旧槧及钞本之有关实学而世鲜传本者。其习见之书概不登载,若明以后诸书,时代既近,搜罗较易,择其尤秘者,间录数种,余俱从略”。

3. 近人著作,以“书不经见”为限,亦“间附数言以识流别”。了解这些特点,对利用这部书目是有帮助的。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哲史室。

来稿时间:1989.8)

文化部图书馆司 1990 年工作要点

[本刊讯] 1990 年图书馆司工作计划要点已确定,主要包括:1. 第 4 季度将以文化部名义召开全国公共图书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2. 完成《公共图书馆条例》的送审稿起草;起草拟定《公共图书馆科技发展规划》、《古籍善本管理办法》、《省直辖市自治区及计划单列市图书馆创建文明图书馆实施细则》、《图书馆学科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等。3. 继续举办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

4. 在部分地区进行公共图书馆干部业务竞赛试点。5. 贯彻 1989 年部际图书情报工作协调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和经验交流会精神,提出北京地区图书情报协调工作的布局规划和实施办法(草案)。6. 推广图书保护及其他科技成果;拟定图书馆岗位培训规范,编辑图书馆主要岗位系列的培训教材;完成《当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一书的审定。7. 继续开展图书馆对外交流。

structure, user information demand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taken, among which, the key point is the information users' thought structure. By way of description and illustration, the author depicts eight patterns of users' thought structure, namely: the blended input pattern, the critical creation pattern, the analogical transplant pattern, the counter-movement pattern, the cross penetration pattern, the intelligence amplification pattern, the pattern of sharing out work and co-operating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 feedback pattern. In order to carry on the reader service well an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readers, two appropriate countermeasures have been put forward by the author. 10 illustrations. 8 tables.

Information users—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User demand—Research

G252

A General Review of Block Books and Book Collection of Zhang Haipeng and his Nephew Zhang Jinwu/Zheng WeiZhang//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90, 16(1). -23~30

Zhang Haipeng (1775-1816) who was from Changshu, Jiangsu Province and styled himself Ruoyun with an alternative name Ziyu, was a famous Chinese book xylographer and book collector. The chief block books made by him are: 1. The "Xue Jin Taoi Yuan" (《学津讨源》), a collection of poems of 20 volumes; 2. 160 copies of "Mo Hai Jin Hu" (《墨海金壶》); 3. 102 copies of "Jie Yue Shan Fang Hui Chao" (《借月山房汇钞》); 4. 1000 volumes of "Tai Ping Yu Lan". Zhang Haipeng's nephew, Zhang Jinwu (1787-1829) was the country's celebrated book collector and bibliographer.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his book collecting activities are characterised as follows: First, he laid stress on that the books collected were only for studying; Second, Most of the books collected were those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works by writers of Jin Dynasty and ancient wood plates for writing (i. e. block book) of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ird, never kept books in secret.

Block books of Qing Dynasty—Review

Book xylographer—Zhang Haipeng

Book collector—Zhang Jinwu

G256.2

Reviewing the Nine-year Contest on Establishing Civilized Libraries/Tianjin Bureau of Culture//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90, 16(1). 31~34

In order to give a more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leadership to libraries and to push the library work forward, the Tianjin Bureau of Culture has since 1980 organized and developed an interlibrary contest centered on a better service among public libraries of the whole city. The contents of it are: the ideological essence of running a library, the library's general mood and discipline, its style and features and its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s. Owing to the fact that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responsible for culture who take the matter seriously and unremittingly, the 9-year contest has not become a mere formality. Each of those 9 years had its plan, requirements, checkups and summing-up, and laid stress on one key point of the contest. Free competition was encouraged throughout